

论秦汉时期“足下”称谓的社会内涵

白 芳(广东省博物馆,广东 广州 510110)

摘 要:“足下”是秦汉时期人际交往中普遍使用的尊称称谓,它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主要用于对各国君主的尊称。秦汉时期,“足下”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少数尊贵独享的尊称,而是成为社会大众都可广泛使用的尊称称谓。“足下”称谓内涵的嬗变反映了统治者称谓政策的改变,对称谓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恰是促成统治者称谓政策改变的原动力。

关键词:秦汉;足下;称谓;社会内涵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9)01-0083-07

收稿日期:2008-09-23

作者简介:白芳(1975—),女,历史学博士,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秦汉历史学研究。

称谓属于语言学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称谓不断产生、旧的称谓不断消亡。由于文化背景、社会习俗、语言演变等外部原因以及称谓发展的内在原因等因素,不少称谓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嬗变,造成了同一称谓古今指称不尽相同的现象。“足下”是秦汉时期流行甚广的尊称称谓,本文以探讨秦汉时期“足下”内涵的嬗变为基点,力图揭示出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足下”称谓渊源考

关于“足下”称谓的起源问题,学界存有两种观点:一是春秋说,二是战国说。

春秋说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凡持此说的学者普遍认为“足下”称谓源自春秋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首倡此说的学者是南朝刘宋刘敬

叔,在其撰写的《异苑》一书中有云:

“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履,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1]

“足下”起源于春秋晋文公时期的说法一经提出,便得到古今学者的普遍认同。明人方以智、清人梁章钜等称谓学大家都认为“足下之称,始于晋文”。^[2]今人承袭此说者依旧数目可观,甚至一些权威性的工具书也采纳了“春秋说”的观点。《辞海》在“足下”一条中云:“足下之称,始于春秋时晋文公称介之推。”遗憾的是,古今学者对“春秋说”的观点仅是单纯的沿袭,并未进行深入的考证。

战国说是一种较新颖的观点,认为“足下”乃是战国时人主之称。持此说的学者有清人顾炎武,^[3]民国人张亮采,^[4]今人袁庭栋、^[5]彭卫^[6]等。但是这派观点的多数学者也犯了前派学者

同样的疏漏,即考证不足,对“足下”的渊源问题仅限于史料的搜集,因而论点略显薄弱,这也是造成两派观点长期相持不下的一个因素。对“足下”的渊源问题有长足推进的学者当是袁庭栋先生。袁庭栋先生在其专著《古人称谓》一书中,取前人之精华、补前人之不足,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足下”称谓渊源于战国时期的论点详加考辨。袁庭栋先生一方面否定《异苑》所载晋文公与介子推史事之真实性;另一方面认为“足下”与陛下、殿下、阁下等称谓是同一类型,是古人以卑达尊风习的反映,从而大大增强了“战国说”的说服力。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袁先生的基础上,略作补缀,以此就正于方家。

其一,晋文公与介子推之史事质疑。

关于晋文公与介子推之史事首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传文曰: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怵?”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皆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入。”^[7]

这段传文清楚地说明了晋文公对介子推的隐退甚为后悔,为了表示自己的过失,所以“以绵上为之田”,即把介子推隐亡的地方绵上赐给他。这段故事,在《史记·晋世家》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之推也。吾力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据正史记载可知,文公以绵上之地封赐介子推,称曰介山,以为纪念,介子推最后是“隐而死”。关于介子推逃禄隐迹的故事还见于《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新序·节士篇》、《水经·汾

水注》等书。

介子推因晋文公焚山而死的记载最早出现在西汉末年。《说苑·杂言》中曾出现“介子推登山焚死”^[8]这样简单的记载,但在同书的《复恩》篇中,却仍作“使人召之,则亡,遂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并无焚死之说,更无取木制履之说。关于焚山的细节最早见于《新序·节士篇》:

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9]

至东汉蔡邕时,晋文公与介子推的故事又添加了割股、焚山的记载。《琴操》云:

龙蛇歌者,介子绥所作也。晋文公重耳与子绥俱亡,子绥割其腕股以饵重耳。重耳复国,舅犯、赵衰俱蒙厚赏,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其章曰……文公惊悟,即遣使者奉节迎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烧死,文公哀之流涕,令民五月五日不得举发火。^[10]

至于“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履”之事,以上各书中均未提及。刘敬叔身为南朝宋人,所著《异苑》属“六朝之鬼神志怪书”^[11]之一种,这样的书里出现“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履”的细节,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袁庭栋先生也认为“《异苑》所载是一个层累造成的不断附会的故事,是不可信的。如果真有此事,如果晋文公真有造木履,称‘足下’之事,为何在所有战国文献与汉代文献中无任何记载?”^[5]

其二,凡关于战国以前之典籍,“足下”均无人际称谓之义。

仅就笔者管窥所及,凡战国以前之典籍、铭文,“足下”一词仅有一例,即《老子德经》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2]“足下”之义显而易见,指脚下,根本与人际称谓无关。假定“足下”称谓源自春秋之说成立,根据语言具有传承性特征的原则推论,我们将会很难理解为何在同一时期的典籍、铭文中从未出现过一个人际称谓之义的特例。

其三,战国时期并不存在君主称呼臣子为“足下”的用法。

《异苑》中,“足下”是晋文公对介子推的尊称,亦即君主对臣子之称。然而在战国时期,此种用法却无一例。此时,“足下”的用法多用于臣民对各国君主的尊称,如《战国策·秦策·范雎至秦》范雎对秦王曰:“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恣”;又如《赵策·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说赵王:“今足下功力,非数痛加于秦国”;再如《燕策·苏代谓燕昭王》曰:“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请行矣,愿足下之无制于群臣也”等。

战国时期,以“足下”作为臣子对诸侯国君主尊称的用法并非偶然。此时期对君主的尊称还有“王”、“陛下”等称谓。之所以对君主尊称“王”,是因为“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13]尊仁义合者为“王”,能够达到“民之所往”^[14]的政治目的,故而“王”是上溯三代下迄战国,使用范围极广的一种君主尊称。尊称君主为“陛下”的原因汉人蔡邕在《独断》中作了详尽的解释:

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尊称君主为“陛下”是古人“因卑达尊”风俗的反映。在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下,臣子与君主交谈时,臣子不敢直接称呼君主的名号,而是通过称呼其身前地位较低的侍从、僚属的方式借以指代君主。古时君主总是坐于高堂之上,臣子侍立于堂下,君主阶下之人即是君主足下之人,通过称呼君主阶前足下之侍从,来指代君主,从而达到因卑达尊的目的。因此“陛下”与“足下”是同一类型的君主尊称。南宋鲍彪也认为“足下”是“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犹陛下也。”^[15]

遍检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从未有过关于君主对臣子尊称为“足下”的用法。语言的产生与消亡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假使《异苑》一说成立的话,很难想象为何在从春秋到战国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足下”的这种用法会如此迅速地销声匿迹。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笔者认为“足下”之称应滥觞于战国时期。

二、秦汉时期“足下”的社会内涵

“足下”之称,滥觞于战国时期,主要用于对各国君主的尊称。秦汉时期,“足下”的内涵至少在三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足下”逐渐退出帝王称谓的体系。

这一变化源于秦帝国的建立。“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16]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国家。秦王政“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更觉得“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16],于是以“皇帝”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谓。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等一系列皇帝独享的御用称谓。所有这些都是要凸显皇帝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同时“陛下”也成为臣民对皇帝的尊称称谓。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一书中指出:“周以前天子无陛下之呼,《史记》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则此号秦礼也。”^[17]此外,这一用法也可以从秦代大量的碑文、奏书中得到印证。

汉承秦制,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皇族称谓在继承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补完善,逐渐制度化。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18]

“足下”退出帝王称谓体系的这一变化,反映出统治者风俗政策的改变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由于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久而成的社会风尚、社会习俗,是社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所以风俗演变的时间轨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并不是完全重合。“足下”在秦末汉初时,也偶指皇帝,但已无尊称之义,尤其用于指称大权旁落之君主。如秦二世

时,赵高篡权,为除后患,赵高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杀死胡亥。阎乐手持兵器闯入望夷宫,对众叛亲离的秦二世威吓道:“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哀求阎乐给其一条生路,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16]此处阎乐自称为“臣”,并非是君臣之臣,而是对本人的一种自称,这一用法在战国时就已盛行开来。又如吕后专权,立少帝为嗣,以强吕氏,引起刘氏宗室与重臣元老的不满。在周勃、陈平的谋划率领下,把吕氏一门一网打尽,迎立代王为帝。东牟侯兴居与汝阴侯滕公入宫驱逐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19]

其二,“足下”的内涵主要嬗变为朋友之间以及社会中下层男性之间的称谓。

唐人段成式云:“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毂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言于足下。”^[20]明人陆容云:“古人称呼简质,如足下之称,率施于尊贵者,盖不能自达,因其足下执事之人以上达耳。后世遂定以天子称陛下,诸王称殿下,宰相称阁下。今平交相谓亦称阁下,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21]稽考史料,亦可得以证实。仅笔者管窥所及,在有关秦汉时期的资料中,“足下”共出现201处,其中“通类相言于足下”者有171处,约占“足下”总用法的85%强。

为何“足下”在先秦时是各国君主的御用称谓,被尊崇、神圣的光环所环绕,而在去上古之世未远的秦汉社会中,“足下”却黯然失色,沦落为社会中下层男性中间广为流传的称谓呢?这一现象除了有语言学自身的规律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加强皇权,制定了“皇帝”、“朕”、“陛下”、“制”、“诏”、“玺”等一系列君主御用称谓,以此强调皇帝的与众不同,凸显皇帝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进而达到“用对压迫者的神圣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22]的目的。“足下”虽然退出了帝王称谓的体系,但是它所环绕的神圣光环并未随之消失。在西汉初年,“足下”又成为臣民对诸侯王的尊称。如汉朝臣为剪灭吕氏余党,命令酈寄游说赵王吕禄:“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19]又如平定诸吕叛乱后,朝臣商议迎立代王刘恒为帝,上议曰:“丞

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将军臣武、御史大夫臣苍、宗正臣郢、朱虚侯臣章、东牟侯臣兴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23]再如高祖时,尉他自立为南越王,陆贾奉命出使,因进游说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24]众所周知,西汉初年,统治者推行“郡国并行”的统治政策,其目的在于“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25]可以说“汉朝的统一,是一种试图综合周、秦两代所长,并尽可能弃其弊弱的重新整合”。^[26]在关于汉初的政治体制类似于周代封建制度的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从与诸侯王相关称谓的角度窥晓一二。西汉初年诸侯王的正号称“王”、“大王”;自称为“寡人”;尊称为“足下”等等,大体都与周代诸王的称谓雷同。但是汉代封立诸王毕竟不是周代封建制度的重演,随着诸侯王势力的膨胀,随着“事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则诸侯王乃埒至尊也”^[27]局面的出现,国家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地方割据倾向间的斗争从文帝即位后开始日益激化。历经文、景、武三代君主的努力,最终确立了中央集权对诸侯的绝对权威,从此诸侯势衰,“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28]自此,“足下”作为权威、高贵的象征已是一去不复返,进而沦落为社会中下层人们之间通用的称谓。

由于秦汉毕竟去上古之世未远,“足下”昔日辉煌的蕴意在人们的脑海中依旧记忆深刻,加之秦汉风俗具有浓烈的世俗化色彩,秦汉人渴望晋身于上层社会的心态使得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往往把“足下”视为对对方十分尊敬的称呼。如“府君足下:不日秋凉,平善。广阔弥迈,相思无违”;^[29]“吾与足下,义结纨素,恩比同生。”^[29]随着时间的推移,“足下”尊崇的色彩逐渐淡化,“闻人称足下则不喜矣”的特色随之增强,甚至“足下”还成为一种不敬的称呼。如东汉初年,群雄割据,隗嚣对刘秀虽谦辞卑礼,但却野心勃勃,秉性耿直的来歙遂发愤质责隗嚣曰:“足下推忠诚,遣伯春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30]又如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孙权为笈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31]

此外,在战乱时期“足下”也是对将领的尊称。秦末汉初,项羽为避免秦朝的覆辙,废弃郡

县制,改行分封制。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封十八路诸侯,暂时得以恢复了秦朝统一前的割据局面。“足下”本是战国时臣民对六国君主的尊称,现被改用来称呼这些军事将领。西汉末年与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地方割据势力严重,武装集团的首领拥兵一方,“足下”成为部下对其军事首领的尊称。如隗嚣被当地豪强推举为上将军后,聘请平陵人方望为军师,方望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32]再如谋臣许攸为曹操出谋划策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33]

其三,“足下”不再是男性尊称的专利,“足下”也用于对女性的尊称。

“足下”作为对女性尊称的用法简牍中共出现五处: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430号简云:

少公夫人足下善毋恙
□□□□□□□□
□伏愿少公夫人□□
少公夫人足下□□

《敦煌汉简释文》第1962号简云:

足下年直居边候望甚急不得甚闻子和少公毋

夫夫

恙年再拜幸甚幸甚行者中公记进羹子和进书夫人足下

甚苦候望春时不和年伏愿子和少公近衣进御酒食

《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270号简云:

建伏地请中公、夫人足下,劳苦临事善毋恙。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198.14号简云:

伏□言
君夫人足下毋恙
□□□□□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10.16A,10.16B号简云:

宣伏地再拜请

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暑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食慎塞上宣幸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

幼都以闰月七日与长史君俱之居延言丈人毋它急发卒不审得见幼孙不它。不足数来

记宣以十一日对候官未决谨因使奉书伏地再拜

幼孙少妇足下朱幼季书愿高掾幸为到临渠隧长

对幼孙治所·书即日起侯官引兵使者未到愿豫自辩毋为诸部殿

前四则简文都是有关下属写给上司及其夫人的慰问信。简文中“夫人”一称谓的含义与今人所理解的概念略有出入。在汉代只有列侯之妻才能称为“夫人”,《后汉书》引《音义》注曰:“列侯之妻称夫人,母称太夫人”。而列侯又是二十等级军功爵之首,凡获此爵者皆为金印紫绶的高官,其尊称称谓多为“公”或“君”。但是列侯之妻却不能享有同样的特权,仅以盛行于社会中下层的男性称谓“足下”作为她们特有的尊称称谓,这一方面反映出语言的缺位现象,有关妇女的称谓,尤其是尊称称谓寥寥无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宗法制的社会就是男权的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是其特有的社会现象。最后一则简文是一位名为宣的男子写给其妻子幼孙的信。从信的内容来看,宣对妻子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从信的格式来看,宣给妻子写信也使用当时书信的套用语“伏地再拜”及尊称收书人为“某某足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在秦汉时期的民间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享有相对的平等权。

概言之,伴随着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足下”黯然退出皇族称谓体系,随之沦落为社会中下阶层男性中流行甚广的称谓。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统治者风俗政策的改变对风俗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们向往跻身于社会上层的一种崇上、崇美的社会心态。此外,“足下”也用做对妇女的尊称称谓,这是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称谓缺位的现象,男女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则是导致语言缺位现象的深层因素之一。

三、“马足下”的产生及与“足下”的关系

“马足下”是一个传世文献罕见使用的称谓,《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也未收录此条目。笔者试对“马足下”的产生、使用及与“足下”的关系略作阐述。

“马足下”是汉代新产生的一个称谓,在汉简中较为多见。其应用的场合大体有两种。其一在谒文中出现:

《尹湾汉墓简牍》^[34]简14反:

东海大守级谨遣功曹史奉谒为侍谒者徐中
孙中郎王

中宾丞相史后中子再拜

请

君兄马足下

《尹湾汉墓简牍》简16反:

琅邪大守贤迫秉职不得离国谨遣吏奉谒再
拜

请

君兄马足下

其二在书信中出现: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4.27A简:

子菟马足下善毋恙苦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03.14A简:

子路元君马足下远辱幸赐承光书幸甚今

《敦煌汉简释文》1612简:

□伏地再拜

长卿马足下因□□候官教卒史妻子集名籍
会月十五日今月已尽次公至今日□

令安请欲为次公为之元母从知其名年人数
愿次公急封移三通会今须移官□

然而,“足下”也经常用于这两种场合。《尹湾汉墓简牍》简17反:

楚相延谨遣吏奉谒再拜

请

君兄足下

这则简文的内容也是谒文,是楚相遣吏拜谒君兄。同是对君兄的尊称,前者用“马足下”,后者用“足下”。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见的书信中,与“马足下”用法类似的场合,也多用“足下”之称。

简34.7B:

赏伏地再拜请

子卿足下善毋恙甚苦谨道

毋忧也万未有取之者

简260.15:

凤伏地言

保卿足下毋恙

简311.17B:

宣伏地再拜言

少卿足下良劳官事因言宣宜□以月晦受官
物来因请□□

简408.2A:

长实孝君使长卿来取孝君衣至长实孝君所
幸赐广意记言孝君衣

□广意丈人毋恙也多问长实足下长实丈人
毋恙也广意在此拜

伏地再拜多请长实孝君等足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知,“马足下”与“足下”是一组在用法与结构上都极为相似的称谓。由于在古代社会,凡有身份的人出行,无论骑马、乘车都需要用马,概称呼马足下之人以达到敬称马上之人的目的,“马足下”与“足下”有着相似的蕴意。

就现有资料考察,“足下”出现在先,“马足下”出现在后;“足下”使用频率高,“马足下”使用频率低。它们用法相似,结构相近,同为尊称称谓。关于“马足下”在简牍与文献中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尚值得进一步推敲。

四、小结

从称谓的变化可以透视社会发生的变革,社会的变革直接、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称谓。“足下”一称谓始见于战国,当时多用来指称君主;秦汉以后多用于普通男性之间的尊称。“足下”称谓沿革嬗变的过程体现了统治者称谓政策的改变,这对称谓的形成、转变与演化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而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恰是促成统治者称谓政策改变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 [1]刘敬叔.异苑;卷10[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梁章钜.称谓录;卷32·尊称[M].长沙:岳麓书社,1991.
-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24·足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张亮采.中国风俗史;第2编第2章第16节言语[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 [5]袁廷栋.古人称谓;卷5尊称·足下及相关称谓[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 [6]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7]春秋左传;正义;卷15·僖公二十四年[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刘向.说苑校正;卷17·杂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刘向.新序;卷7·节士[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阮元.宛委别藏;第71册·琴操[M].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12]老子道德经;卷下·守微[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班固.白虎通疏证;卷2号[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4]董仲舒.春秋繁露义证;卷5·灭国[M].北京:中

华书局,1992.

- [15]刘向.战国策;卷5·秦策·范子因王稽入秦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7]高承.事物纪原;卷1·朝廷注措部[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诸子百家丛书·独断;卷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9]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0]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忠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陆容.菽园杂记;卷13[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列宁.给阿·马·高尔基[M].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11.
- [23]汉书;卷4·文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4]史记;卷97陆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5]史记;卷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6]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6.
- [27]贾谊集校注·甲编·等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28]汉书;卷14·诸侯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9]严可均.全后汉文.[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 [30]后汉书;卷15·来歙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1]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2]后汉书;卷13·隗嚣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4]尹湾汉墓简牍[A]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 王立新)